

引子

中国救助流浪儿童机构诞生于唐代

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比较完备的恤孤养老慈善机构诞生在唐代。武周时期佛教兴盛，长安、洛阳及地方各道、州的佛寺住持经营悲田养病坊，收养孤寡老人和流浪儿童。朝廷对佛寺的善举给予经济资助，这种机制发展了百余年。

宋代是中国古代最重视慈幼事业的王朝，救助流浪儿童进入专业化阶段。北宋初期，慈善机构和唐代一样，往往孩子和老人乞丐病人一起养，蔡京当政后，给予孤贫小儿免费上学

的机会，这种教养结合的救助方式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鸦片战争后，中国慈幼事业向近代转型。西方教会主办的孤儿院、育婴堂、盲哑儿童学校等遍布全国。

本土慈善家群体也发展壮大，以上海为重心，成立了一批养、教、工三者结合的民间救助儿童机构。比较著名的有高凤池、李平书、王一亭等人1906年筹款创立的上海孤儿院，曾铸创办、盛宣怀捐助的上海贫儿院等。

民国实业家熊希龄裸捐救助流浪儿

2012年11月16日，贵州毕节五名男孩，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，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。这则不幸的新闻让救助流浪儿童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。在连年战乱、社会动荡的民国时期，儿童流浪乞讨现象严重，张和平以上海街头乞儿为原型创作的《三毛流浪记》，牵动几代人的心。但也是那一时期，现代意义上的慈善家群体成长起来，救助儿童的民间慈善机构发展壮大。这些机构都有各自的时代局限，且因为社会环境变迁，难以复制，但那些先驱的精神和经验，仍是今天值得借鉴的遗产。



香山慈幼院的家庭总部公共游戏室



熊希龄

【香山慈幼院】29年共养育7000多名孤贫儿童

二百多孤儿无家可归，香山慈幼院开张

北京香山如今是旅游胜地，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它几乎是慈善教育的代名词。发起这项事业的是熊希龄。他是晚清翰林，主张维新立宪，1913年当选中华民国总理，因不满袁世凯独裁，不到半年就愤而辞职，彻底退出政坛。当时他已44岁，本打算在天津隐居终老，但1917年夏，直隶一场大水灾改变了他的后半生。看到大批儿童和父母失散，甚至很多家庭把孩子扔在街头插标贩卖，熊希龄忍不住悲叹：“可怜这些孩子，他生下来并无罪恶，为何遭此惨累呢？”

熊希龄回到北京，主持水灾督办处，同时利用自己

的声望和资源成立了两所临时慈幼局，一所男校，一所女校，委托好友英敛之收留1000多名流浪儿童。灾情缓解后，大部分孩子被父母认领回家，但还有200多个孤儿没有亲人来接走。熊希龄决定，将临时学校扩建，开办慈幼院。

北京城内没有可以开设慈幼院的大片土地和房屋，经时任大总统徐世昌斡旋协商，前清内务府同意，出让废弃的香山皇家园林静宜园，即今天的香山公园。1920年10月，香山慈幼院开张，熊希龄任院长，他同时也是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。

有钱人家主动交学费把孩子送进来

熊希龄希望香慈能够成为一所先进的现代学校，而不是儿童收养院。他邀请蒋梦麟、胡适、李大钊、张伯苓等数十位著名教育家担任香慈评议会的评议员，还与蔡元培、陶行之等研究如何改进香慈教育。到1926年，香慈发展为包括6个分院的综合性慈善教育机构。一院为蒙养部，即幼儿园；二院为小学部；三院为中学和师范部；四院为职业教育部；五院为技工部，半工半读；六院为大学部。慈幼院学生中学毕业后如考取大学，该部负责为他们提供学费和解决各种问题。因为香慈教育先进，师资雄厚，连一些有钱人家也主动交学费把孩子送

进来。

职业教育部是香慈的一大特色。该部设有农业、畜牧、养蜂、陶工、金工、织染、制鞋、照相、银行等职业班；还曾办过高级土木工程科、高级机械科等专业班。职教部不仅培养高级工程师，香慈中小学部的学生也都要到这里学习劳动技能。

香慈的老毕业生说，如果不是熊希龄，香山的红叶不会像今天这么繁茂。香山园林荒废期间，旗民常来砍伐古树。慈幼院成立后，不仅制止砍树，还发起植树节，每年组织师生植树护林。

早在1934年已采用小家庭教育模式

1949年，奥地利创办世界第一个国际SOS儿童村，采用小家庭教育模式。香慈早在1934年就已开始这种实践。在与慈幼院孩子接触中，熊希龄发现，大多数孩子因为缺乏亲情温暖，性格孤僻，这个问题不是给他们良好的课堂教育和衣食条件就能解决的。熊希龄投资建立了十几个独立平房小院，把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按家庭编制分配，十几个孩子一组，住进一个院，互称兄弟姐妹，家中安排一位女教师作为“娘”。熊希龄以“总家长”自居，设立家庭总部，邀请各家孩子来作客。

熊希龄去世，夫人继承遗志坚持经营

1937年，北平沦陷。熊希龄和毛彦文试图将香慈迁至江西、湖南等地，但战火蔓延之迅速超出他们想象。1937年12月，熊希龄因悲愤交加、过度操劳，突发中风去世。

毛彦文继承其遗志，坚持经营香慈，直至1949年，她迁居台湾。同年，中共中央进驻北平，看中香山易于防空便于警卫，副院长雷动与理事长雷洁琼商议后，将香慈3000多间房子借给中共中央办公。香慈搬至西安门大街，1953年迁入阜成路新校舍，直到1966年，这个新中国最后一家私立学校，走到历史终点。

从1920年至1949年，香慈共养育7000多名孤贫儿童，将他们培养成才，其中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

1931年，和熊希龄并肩经营香慈的夫人朱其慧去世。为纪念亡妻，熊希龄将两人共同的财产全部捐给香慈，成立“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”，共有大洋近28万元，白银6.2万两。1935年2月，66岁的熊希龄与37岁的民国名媛毛彦文结婚，婚后毛辞去教师工作，专职辅佐熊经营香山慈幼院，老夫少妻共襄慈善，一时传为佳话。香慈董事会认为，熊希龄既已再婚，应将一半产业归还给他，以作日常家用，但夫妇二人都坚决拒绝。后来董事会决定，每月发给熊家800元生活费。

会计长盛长忠、水文专家谢家泽、新中国铁道部部长刘建章、邮电部部长王子纲、外交部副部长张勃川等。

著名的双清别墅，原是熊希龄住所，现已成香山名胜。创办香慈初期，熊希龄在香山北辛村购买了一块土地建熊氏墓园，他的双亲和夫人朱其慧都葬在这里。熊希龄在香港逝世后，骨灰埋葬在当地。1992年，受定居台湾的毛彦文委托，香慈校友会代表赴香港将熊希龄骨灰迎回香山。熊希龄在世时，将每年7月7日定为香慈“回家节”，毕业的校友在这一天回母校“探亲”。如今，香山慈幼院虽已不存在，但一到7月7日，仍有许多白发苍苍的校友到香山聚会，那是他们永远的家。

【土山湾孤儿院】学艺出众的孩子还被送去欧洲深造

从晚清至民国的100多年间，教会是中国儿童慈善事业的主力军。尽管教会孤儿院的管理质量良莠不齐，“文化侵略”的背景也颇受质疑，但其开创的“教、养、工”三结合的方式，对本土儿童救助机构具有深远启发意义，尤以上海土山湾孤儿院最为著名。

1847年，江南发生水灾，一位法国传教士在松江设立孤儿院收容灾民弃儿。经过十余年发展，同治年间迁至上海土山湾。孤儿院开创之初设立了鞋作和木工两个部门，后来逐步扩展出风琴制作、图画间、印书馆、照相部、中西鞋作、五金部等部门。木工部以制造教堂工艺品著称。

除了在育婴堂长大的孤儿，许多父母健在的贫民子弟也被送进土山湾。这里不仅保障基本的衣食，更重要的是提供完善的职业技能培训。

日军侵入上海后，土山湾孤儿院在租界中虽然未受侵扰，但也因战事影响走向衰落。抗战胜利后，国民政府收回租界主权，土山湾划归上海教区，不再受法国政府庇护，工艺产品的海外销路大打折扣。1956年，全国开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，经过公私合营等一系列改革，1960年，土山湾孤儿院结束了近100多年的历史。

【战时儿童保育会】组建于国家存亡关头，格外重视教育

抗战爆发后，中国各地流离失所的儿童激增，仅武汉一地，难童已过万。在多方努力下，1938年1月24日，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会成立。

保育会成立后，工作人员每天到车站、码头、街市、兵营旁、难民收容所等地，招收流浪儿童；还有一批工作人员经过培训后，到战事最为激烈的徐州、开封、郑州等地，抢救出数千名难童。四川、成都、广东等地先后成立了儿童保育分会，共建立保育院54所。在宋美龄的号召下，各分会一般由当地行政首长夫人出面主持，妇女界、教育界、宗教界等知名人士组成理事会，负责具体工作。

儿童保育会组建于国家存亡关头，在照顾儿童衣食起居的同时，格外重视对儿童的教育。一方面，在日常教学中特别强调爱国主义、抗战形势等政治课程；一方面，注重生产劳动教育，使儿童也能参与生产救国。劳动内容有开荒种地、饲养家禽等。男生要学木工、理发、打草、制肥皂、做豆腐等；女生学做衣服、做布鞋、织布、织毛巾等。对一部分年龄较大的难童，则

安排进行职业培训，如护士、木工等。

在管理上，由于难童数量庞大，教职员有限，各保育会自创了许多儿童自治的政策方法。如浙江第二保育院的孩子成立了“战时儿童抗日自卫队”，下设训练、生产、卫生、教育和生活五个部门。卫生部下设整洁团，整洁团下有洗衣队、缝纫队和看护队。“每月一次全院儿童被套的洗涤和消毒，每个院童服用品的分别编号，4月份60多个麻疹病童的看护，都是他们自愿地执行与完成”。

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小学部的孩子，学着边区大人样子，按照普选制度的办法，选择自己所爱护的代表，组织乡政府，领导小朋友的学习、生活和课外活动。

在诸多矛盾中，战时儿童保育会坚持八年，救助儿童近3万名。许多孩子成长为精英，包括画家伍必端、作曲家杜鸣心、指挥家陈贻鑫、中央乐团副团长杨秉荪、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李华瑛、中国芭蕾舞团副团长蒋祖慧等。

据《文史参考》报道